目　　录

板荡催时变，磐珊向光明…… 周士观（ 1 ）

——九十生平自述

家世和幼年

辛亥革命时期的隐遁生活

初入仕途

威斯康辛大学的四年

幻梦破灭

欧美之行

一次错误的旅行

两种错误的选择

转折的开始

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

·耆年自述·

解放战争时期“川大”反美反蒋

斗争的回顾……彭迪先（ 37 ）

“李实育事件”和坚持开除三青团骨干肖连

荣的斗争

“三教授事件”

全校教授罢教三天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揭穿“金圆券”的“货币魔术”
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发行“地方流通券”的
　　阴谋
驳斥“美苏大战即将爆发”的谬论
关于举行“尊师运动大会”的斗争
忆述我当年在大陆工作片断…… 李默庵（52）
附：李默庵给全国政协常委翼异之的信
去台湾及返回大陆前后…… 毛翼虎（64）

·华侨抗战史料·

忆蚁光炎先生及泰国华侨的
　　抗日救亡运动…… 许　侠（78）
参加泰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…… 杜　英（86
七七事变后的募捐运动
周恩来的亲笔信
十八涌跑马场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
日寇入侵后成立“泰国抗日义勇队”
在敌人眼皮下为《真话报》建立地下印刷厂
战后进步侨团蓬勃发展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

·军事史料·

军调部大同三人小组工作纪实…… 李晋忻（94）
偶然调用——重临古都——初次受命——飞往
大同——小组会议——骆驼庄调查——坦克·
日军——朔县易手——大同请愿——白土窑前

——偶逢赵尔陆——记者仓夷——访问朔县——乌云密布——小组撤退——停职反省——再到大同

·CC内幕·

“二陈”与国民党CC派…… 袁英林（117）

CC的来历——CC头目陈果夫、陈立夫——CC派对国民党党务权的夺取——CC在行政方面的扩展——造就CC分子的大本营——第三处与中央政校毕业生指导部和同学会——CC派在经济方面的渗透——CC派插于教育、文化、宣传等方面的情况——CC与中统。

CC派与反CC派在江苏的一场斗争…… 杨　谷（131）

·文化史料·

王昆仑先生和潮剧…… 林淳钧（135）

忆戏剧教育家刘仲秋…… 阿　甲（146）

追忆夏声戏校与演剧九队的关系…… 吕　复（150）

·经济史料·

去台湾采矿炼铜的经历…… 张正容（153）

孔祥熙与复兴公司…… 宁鲲南（158）

China

·参考资料·

武汉国民政府辖区的演变……毛　磊　刘继增　袁继成(164)

日本外交档案中有关孔祥熙暗中
与日寇和谈的纪录……杨　凡译(186)

补充 · 订正 · 质疑

关于“边纵”问题对《我所知道的卢汉》
一文的订正……马仲明（193）
谈杨乃武与刘锡彤的仇恨……何桐森（195）

板荡催时变，磐珊向光明

——九十生平自述

周 士 观

作者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常委、副主委，全国政协常委，一九八四年去世。

本文由周士观先生口述，经许汉三先生整理而成。因周士观先生年高体衰，记忆力减退，故自述后面部分仅存大概，这是引以为憾的事。

家世和幼年

我出生于一八九三年（光绪十九年）五月。出生地点是福建的闽侯县（现福州市）。十岁以前，一直住在闽侯。

闽侯县在中国近代史上真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之区。清代中国改革派的先驱者林则徐；稍后以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，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严复和林琴南，以及晚清同光诗派的重要成员陈衍、陈宝琛、郑孝胥等都是闽侯人。

我的父亲名登皞，是光绪举人。后经大挑实授知县，就一直在京兆尹所属的宁河、武清、霸县、大城、东安等县任知县。以后因考绩优异，被擢升为赵州直隶州知州和都察院广西道御史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又曾任过肃政史和绥远道尹，还代理过绥远都统等职。一九四〇年在上海逝世。

父亲算是上层的官吏，又是福建闽侯人，旧诗词都很有根底，和同光派诗人陈宝琛还有亲谊关系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父亲的政治历史和闽侯的乡望，都对我的一生有一定影响。解放以前的几十年，我大部分的政治活动都和西北的马福祥、马鸿逵父子有关，其原因就由于我的父亲和马福祥是多年的同僚，且结成了挚友。

我从大学时期到留学美国，都是学习应用化学的，有一个时期又专学军用化学。可是在我的中年时期，却醉心于封建文人中名士派所艳羡的“四雅”——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我的几个妹妹也都擅长诗画。这就同我出生于闽侯县有关了。

在我的中少年时期，正是同光诗派的极盛时期，我喜欢林琴南、陈衍、樊增祥、易实甫等的诗，而且崇拜他们。我曾有诗句云：“看过夫人都似婢，果真国士愿称奴。”这是把林琴南等视为国士的。我当时的喜尚，于此也可见一斑。

我的青年时期，一直是跟随着父亲，即所谓“随宦读书”的。所以在我十岁离开闽侯北来后，在宛平和宁河等地度过了我的小学时期。

一九〇六年我进入了天津客籍学校。这个学校是中学，但又不同一般中学，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所创办的贵族子弟学校，专收大官僚的子弟。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、袁克文等都在这个学校读书。

袁世凯当时用河工经费办了这个学校。他用厚薪聘请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些名宿来任教，如教经学的孙师郑，教历史的方地山，在当时都是很有声望的学者。

袁世凯办这个学校还有一番深意。袁世凯由于小站练兵，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，后来，正是这批干部成了北洋军事势力的基础。但在政治干部的培养方面还是空白。

清朝以八股取士，一直重视正途出身（即科举出身）的人。袁士凯自知在政治上有很大弱点，如不是依靠他祖父和父辈的勋望及他在朝鲜的军功，他是很难爬上高位的。所以在一九〇五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改设学堂之后，他就积极在教育方面表示意见，

并且办了这个学校。这个学校专收大官僚的子弟。据当时的传说：袁世凯认为这样的学校，除了给他的子侄辈以受教育的机会外，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他的儿子在尔后的政治活动中，培养一批较为密切的朋友，一种力量。对袁世凯本人，也是造就一批未来的政治支柱，因为这些贵族子弟，将来都会依靠他们各自的父兄力量，很快地走上政治舞台的。

我的父亲当时还是知县，作为知县的子弟的我，原没有资格进这个贵胄式的学校。可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，我的父亲在小站附近几个县做过知县，政绩卓异，为袁世凯所赏识，所以得以破格地进了这个学校。

我当时在这个学校中年龄最小——十三岁，父亲的官级又不高，因而常常受那些大官僚子弟的欺侮。当时那种不平等的情况，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，使我的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，也滋生了我的反抗思想。

我常常受到凌辱，也常常向学监面前控告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因为学校当局都是些逢迎拍马之徒，明知我是受屈的，也不敢替我说话。甚至还会颠倒黑白，站在那些大官子弟一边，来申斥我。我年纪虽然最小，但却很有力气，因而遇到这种不平，我就采取直接行动同欺侮我的人对打，并且常常取胜，那些大官僚子弟的气焰也从此稍有收敛。

一个十三岁的小孩，当然是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的后果，气自然是出了，可是其后果就是转学。一九〇八年，在我十六岁时，只好转到北京的顺天中学。

在顺天中学中，两个同学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一个是张申府，一个是梁漱溟。这两个人在抗日战争时，都是知名的民主人士。由于中学是同学，往来比较多，谈话也比较随便。只是由于政治上彼此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后来就各自走了似同而又不全相同的道路。

张申府和梁漱溟在中学时期都有奇特的表现。两个人都喜欢

离群索居，作深湛之思。张申府喜欢数学，后来成了我国有名的罗素派的哲学家。梁漱溟幼年受继母虐待，曾一度想遁入空门作和尚，因为不成功，就转而研究佛学，在很年轻时就写成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，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。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见解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，当然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。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，都曾产生过一些影响，也是事实。这说明一个人，只要肯于用思想，肯于研究问题，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。

辛亥革命时期的隐遁生活

辛亥革命，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。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为袁世凯所篡夺，但它推倒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治制度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这种伟大的功绩已载之史册，是尽人皆知的。而且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，由于民主主义的深入人心，使此后的一切野心家，想做皇帝的，或者想做变相皇帝的，都碰得头破血流，成为历史的罪人，这就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。

可是，这震动中国大地的革命浪潮，对于我却并没有什么影响。我当时十九岁，已是成年人了。在南方，许多十五六岁的青年大批地投入军中，参加了革命，而我却随父亲隐居在宁河县的芦台镇。我们的家所以迁居芦台，是为了逃避第三镇的兵变。

在芦台我闲居了一年多。除了涉猎一些笔记小说和诗词，以消磨时日外，就是向芦台运盐工人中有武功的人学拳。我本来身体就很好，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，拳术有了一定的基础。我以后身体健康，晚年精神颇佳，也和这时的练拳有关。

处于革命的激流之中而没有革命激情，今天想来似乎奇怪，然而据我当年的家境影响来看并不足怪。我的父亲当时是清朝的官吏，又一向为人清正，他平时自律并以之教育子女的，都是儒

China

家传统道德观念。父亲也知道清王朝的崩溃，已是无可挽救；然而要他对一向所忠心尊戴的君上，转脸又当作仇敌而诟骂之，打倒之，则认其为道义所不允许的。

父亲可以不作保皇派，但也不能作革命派。他只能暂时迁居芦台，静观时局的变化。而我一向是非常尊崇父亲的，也只能一切遵照父命而行。所以虽然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之中，我不但没有准备，甚至思想上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场革命中应该有什么行动。

初入仕途

一九一二年，父亲把家庭由芦台迁回北京，以后出任了袁世凯政府的肃政史。我本人则于一九一三年考入了北京工业专门学校，学习应用化学。一九一七年毕业，参加文官考试，录取后被分发到农商部实习。

一九一八年，我的实习期满，被正式分发到该部的工商司担任技士，同时兼任国务院秘书厅的科员。这样我总算是作了官吏了，虽然是初入仕途，而且是低级的官吏。

当时北洋政府的各部、院会，因袭着浓厚的清政府的腐化习气。在国务院的秘书厅中，我听到各部的总长们不但把八大胡同（过去妓院的集中地）作为他们日夜行乐之所，而且国家的许多重大军事政治问题，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妓院中，在玩乐嬉戏中决定的；一切肮脏污浊的交易，也是在那里达成的。

我当时还年轻，刚出学校不久，看不惯这种腐败污浊的现象，因而就寄情于琴、棋、书、画的所谓“四雅”，以消磨岁月。

工商部的工作与我所学的专业一致，原是可以展其所长的。但是那里的现象，却使我难安于位。一九二〇年的春天，我奉到上级命令，要我审批一桩申请复写纸专利权的案件。批准专利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权，原是保护科学技术发明的有力措施。但若给予享受专利权的，不是先进的发明，市场上已有优于申请专利权的同类产品存在，那末，这种专利权的颁予，就不是保护先进的技术发明，而是保护落后的产品了。这原是极易判别的是非问题，但在贪污横行的北洋政府中，完全可以颠倒是非，使你无可奈何。

我接到审查复写纸专利权的申请时，还没有着手审查，科长就告诉我：司长和次长都很注意这件事，希望能给予专利。为什么还没有审查，上级就暗示给予专利权呢？这是因为这个复写纸的制造商已经先同工商部的次长、司长们讲好了利益分成条件，他们既然利害相关，自然要力促其成。我懂得这其中的奥妙，但不愿意作这班人的工具，与他们同流合污。我在作了技术检验之后，发现申请专利的复写纸，不仅不及日本产品的质量，也不及商务印书馆产品的质量。如果为抵制日本产品，保护本国产品，就是质量稍差一些，也可以给予批准。但它连商务的产品也不如，如果给予专利，岂不是打击先进！因而就坚决不同意给予专利权。

但是，我当时是到部工作不久的低级职员，无权改变上级的意见。相反，上级倒可命令我必须贯彻他们的意图。这时我只能有一种选择：要么违心地执行上级的命令，促成他们的肮脏交易；要么自己辞职，让别人去做。于是，我就在回家同父亲商量后，毅然决定辞职，出国深造。

威斯康辛大学的四年

一九二〇年夏天，我离开北京，放洋赴美，考入了威斯康辛大学，继续攻研化学。

就在我栖身舟中，飘行于淼茫浩瀚、万里无垠的太平洋中时，国内又发生了直皖战争。皖系垮台，直奉系抬头，政治更加腐败混乱，军阀间的战争连绵不断。我当时二十六岁，不能不把

自己所学的专业和个人的前途联系起来考虑；也不能不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考虑。

在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人中，大都不能用正确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，用来研究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。但都有一种朦胧的爱国、救国思想，大多数人也都想用自己的所学，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。但要走的道路却各不一样：有的认为教育可以救国，有的认为实业可以救国。我当时则是信仰后者的。所以在威斯康辛时，我选择攻读应用化学；考虑到回国后自办工厂，原料上不致于仰赖外国，又特别注意于油漆的研究和制造。我认为油漆的用途很广，原料又很丰富，可是国内的油漆却仍用土法制造，产量太小，供不应求，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，漏卮之大，实在惊人！“挽回利权”，不正是报国的一途吗？我觉得自己在研究和将来职业上的选择，是正确的，完全符合高尚的救国的目标。

我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图书馆中，看到许多美国在华传教士发回去的大量报告。这些报告对于中国高山大河之美，关塞厄隘之险，风俗、人口、物产、道路，都记载得十分详细，并且常常附有照片说明。

我还发现那些报告，有明显的两种倾向：一是渲染中国的落后；一是渲染中国的富饶。最初，我颇惊佩外国人的研究精神，认为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所作的调查工作，远远地超过那些尸位素餐的中国官吏。这种看法在留学生中一向是相当普遍的。

后来我想：他们这样做总有一个目的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似乎和传教无大关系。如果是为提供中国建设作参考，那为什么不就近送之于中国政府，却寄回万里之远的美国呢？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：这些虽然是传教士个人的一种活动，实际上却隐藏着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阴谋，这还是当时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活动的共性。认识了这一点以后，就更坚定了我的工业救国的思想。

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两年，取得了硕士学位。这时我踌躇满志，摒挡行装，购买了大批专业用书，准备买舟回国，施展自己的救国宏图。

我在美国学习时，大大受益于美籍德国人卡伦伯教授。卡伦伯为人正直，教学态度非常认真，对学生的要求也特别严格。他对我的返国并不十分赞成。一天我正在整理行装，卡伦伯教授来到我的寓所，寒暄几句之后，对着我所买的大批书籍，他意带讥讽地说："周先生，你是把化学的知识都买回去了，这很好呀。可是你要注意，万一在路上发生了意外，你的书沉落在海底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难道再回来就学么？"言外之意是说，在化学方面我的知识还不够坚实，还需要继续深造。

卡伦伯教授带有讽刺意味的几句话，对我触动很大。经过冷静的考虑，觉得我虽然已取得硕士学位，但自己所学的确实不多，不坚实，有许多重大的化学问题，不能独立解决，因之自己不能自欺，更不能以硕士的招牌欺人，遂决定留下来再学。于是我继续学习了两年半，共在美国学了四年半。

在留下来继续学习的两年半中，我进一步认真地研读了机械化学、实用化学、电化化学、有机化学以及工厂建筑和管理学等理论和实用的知识，对化学方面的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收获。

我当时认为要振兴中华，一定先要做到"炮利船坚"，要加强军事工业。所以在学习一般功课之外，我还暗地里向卡伦伯和费司两个教授学习军用化学的制造和防御。

我在国内和国外所学的，都属于应用化学。我怕自己所学的和实际脱节，还特请费司教授介绍我在德国的一个油漆工厂实习。实习时，我有意识地从简单的洗铁片第一道工序起，一直到管理处的最高管理工作止，每一个车间，每一道工序，都不是看，而是确确实实地亲自动手做，直到真正懂得、学会操作为止。这样一直干了六个月。

幻梦破灭

我于一九二〇年赴美，一九二五年回国。在留美的四年多时间里，国内的思想界在振兴中华、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上，发生过为时不短的论争。这次论争波及到国内知识界的各个阶层、各个方面。但主要的方面是两个：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彻底革命派；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承认现状的改良派。

我并没有参加这次论争，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根据我当时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，是天然的承认现状派。我虽然也不满意军阀的混战和北洋政府的腐败，甚至还自以为抱有一种纯洁无瑕的救国之心，然而我理想的顶点，也不过如马克思所说："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"而已。

在我未动身回国之前，国内南北对峙的形势更加尖锐。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势力在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后，正如风扫电击，所向无敌。但我没有重视那个新生的势力。其原因一是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够；二是代表国民党的邵元冲和我在威斯康辛同学两年，给我的印象不佳。

一九二五年春天，我回到了我愿为之献身的祖国。但我完全没有想到：在美国勤奋苦学的一套本领，竟然到处碰壁，毫无用处！

一九二五年，我的父亲周登皞还在担任绥远道尹，我先去绥远省亲。绥远的都统是马福祥。在我奉父亲之命去拜见这位和父亲友谊很深的父执时，马福祥得知我是留美国的硕士，而且学有专长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，马上就设立一个实业开发筹备处，以后正式成立实业厅，派我主持其事。

我对马福祥的这番热情，是既感知遇之恩，又喜有了用武之地。所以在受命之后，就以最饱满的热情，去搞绥远省资源的调查。

绥远省地处塞北，过去是百里无人，风沙连天。我带着两个马巡（即警卫员），架着一辆骡车，风餐露宿，问老卒，访荒村，经时数月，几乎踏遍了绥远全境。

我发现绥远虽然素称贫瘠，但资源却很丰富。土碱、铁矿、甘草、枸杞、头发菜、红萝卜等，产量很多，都是很好的轻重工业的原料。特别是清水河（即包头）的铁矿，我不仅进行了调查，而且用土法炼成了钢锭。

马福祥看了我炼出的钢锭，又听我介绍了全省资源的情况，开办实业的思想更加坚定，决定由绥远筹集资金，先从开采铁矿动手。而我本人更是兴致勃勃，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已到，就积极草拟计划，搭建班子，动起手来。不料我们的开采计划送请农矿部批准时，农矿部的工矿司长却说已经有人申请开采在先，绥远的请求不能同意。这样一来，就使我半年多的辛苦调查付之流水；我在工业上的绮思美梦也完全破灭。可是据我事后了解，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垮台，还没有听说有什么人准备在绥远开采铁矿！

绥远的开发实业计划既然成了泡影，我就决定自己开办油漆工厂。我的集资对象，多数是北洋政府的军阀和官僚。筹集了二十多万元，就在天津西开购地建厂，订购机器，积极进行。可是工厂还没有正式开工，由于政局的不断变化，股东纷纷撤股，准备逋逃。工厂因此夭折垮台，自己反而赔了两万多元，罄其家中所有的积蓄，才了清了这笔欠债。

在筹办油漆工厂时，我还附带建立了中华化学工艺社。内部设立了化验检定、工业设计、代购机器书籍及国内外工业咨询等四部。把理论研究、设计咨询和实际业务，并成一体，携手并进，相互促进，计划可以说是完美周密的。可是也因为集资不易，而四部的理想负责人尤不易得，也只是存在了几个月，便宣告瓦解。

到这时，我的工业救国的雄心，已经荡然无存。但还需要有

China

个嗷饭之地。于是，我通过我的亲戚曾毓隽见到了当时的执政段祺瑞，要求在执政府中设立一个军用化学研究机构，由我负责主持，研究军用化学，以为将来国家军事上的非常之用。

这个时候，我在归国以前的一切幻想，已经基本破灭了。我虽然在口头上，乃至在用文字写成的“条陈”上，振振有词地讲，设立这个研究所，是为的政府，为的国家民族，实际上我知道人们是不相信的，也从来不这样考虑问题的；一些人考虑的，首先还是自己的利益和地位。应该说，我的条陈又何尝不是一片违心的话呢！大家都在谎言中过日子，这是历来官场的习气，你无法改变它，甚至也无法逃避它。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。

曾毓隽是段祺瑞的亲信，在段面前说话有力量。我和曾不是一般的关系，曾也用了他的一切力量来促成此事。然而并不成功，其原因就是段祺瑞考虑的，不是军用化学的研究在中国是否需要，而是这么一个小小研究机构的设立，会不会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。

一九二〇年前，段祺瑞可以说是北洋政府中最有权力的实力派。段的为人，言行十分果决，但在他执政时期，情况完全两样。一九二四年曹锟的垮台，是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倒直的结果。由于冯、奉两方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控制北京政权，所以才把段捧出作为傀儡执政，以缓冲两方的冲突。段是没有多大实权的，还要时时提防奉、冯两方任何一方的怀疑。所以在我和曾毓隽把计划对他陈述后，他十分诚恳而又为难地说：“中国的军事装备武器等非常落后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军用化学更是落后。你建议设所研究，确是中肯之见。我自己从前参加小站练兵，以后置身军旅，民国以后执政中枢，无时不以整军经武为念。虽然迄无成就，且多经变故，为人诟骂，但富国强兵之志，却老而不泯。可是我现在虽身为执政，却无能为力。涉及军事方面的大小事情，更要慎重。如果我批准设立这个机构，本来是应你们所请，且于国家有利；可是别人将会怀疑这其中或另有文章，结果

China

这件事未必能顺利进行，反会引起别的麻烦。我看此事以搁置起来为好。”

段又说：“至于你，既然有志于军事工业，我可以介绍你到山东看看。张宗昌现在是山东督办，又有德州兵工厂的基础，这个人为人豪爽，很好合作。你去试试，也许会有办法。”

一九二六年，我持着段祺瑞的介绍信，同曾毓隽一道到了济南。曾毓隽的同往，大大地增重了段的介绍信的力量。因为曾毓隽是执政府的要人，他的陪往，证明段的介绍，不是浮泛的应酬。张用热诚的态度欢迎我的到来，马上发表我为山东省署技师兼任德州兵工厂副厂长（厂长由张的亲信，可能是督办公署的参谋长兼任）。

张宗昌豪爽地对我说：“你来搞兵工厂，太好了。我非常希望能把这个兵工厂办好。你要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钱。将来办好了留着打日本人用。”

张宗昌是绿林出身，在北洋军阀中被称为“狗肉将军”。在政治上一贯反对进步，摧残革命，鱼肉人民，横征暴敛，罪恶昭彰，又利用白俄军队，参加内战，杀害同胞无算。在生活上他又“三不知”，即不知有多少兵，多少钱，多少姨太太。这样一个人竟能在北洋政府中横行一时，实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奇特现象。我当时接受段祺瑞的介绍，去投靠他，并准备替他发展军事工业，当然是一种错误。

幸而事情并没有实现。我受委之后，就到德州兵工厂进行实地调查。德州兵工厂原归陆军部领导，是国营的兵工厂，但因北洋政府的政令多年不出国门，德州兵工厂早已奄奄一息。张宗昌到了山东后，他部下有技术的白俄兵，又把工厂中能用的机器拆迁一空。我去的时候工厂中还驻有军队。原来很大的一个工厂，这时竟变成瓦砾遍地、蓬蒿没人的一片荒凉景象。我和张乍见面时，张的豪言壮语，曾引起我一片幻想，好象一个烟囱林立，火光烛天，机器轰鸣，如象我在外国所看到的那些大工厂的雄伟壮观

局面，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。不料我看到的现实竟是如此，真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当时我认为张宗昌虽然慷慨地应诺，“要多少钱给多少钱”。但以当时兵工厂状况来说，要做到能够正式生产，哪怕生产普通的枪炮，都需要从头做起。确实要花许多钱，也要相当长的时间。当时北伐军正在顺利前进。我和南方的革命阵营没有关系，双方胜负的局面虽然还看不出来，但张宗昌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准备打仗方面，南北方的政治局面很不稳定。

我在德州住了三个月，根据调查结果，写了一个报告给张宗昌。我在报告中说明，德州兵工厂要打算起死回生，具备相当规模，需要从头起步，需要外国的经验，也需要外国的人才。我要求出国作军事工业的专门考察。实际上是借口出国，静待国内的变化。

张宗昌慨然应诺，马上发给旅费五万元，派我和一个同学名陈祖亚的，到欧美考察军事工业，时间定为一年。

我在一九二七年年初出国，考察未毕，张宗昌已经垮台。我回国以后，南京政府早已建立。从此我的生活也迈入另一个途径。我从事工业的思想，不仅在一再碰壁中彻底破灭，而且从此以后也再没有和工业打过任何交道。“学无所用”，“用非所学”，是旧中国的普遍现象，是多数知识分子的悲剧。

张宗昌的为人，历史早有定论，我前边也有论述。但有两点还不无可取。一是他对母亲孝顺，二是有民族气节。他在台上的时候和日本军阀时有勾结。日本军阀为他出谋划策，卖给他军火，唆使他打内战；他自己为着扩充兵力，争夺地盘，也尽量依靠日本。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和以老子自居的那种气焰，他却不能忍受。他对我说办好兵工厂，将来用来打日本人也是真话。他在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打垮后，逃往日本别府温泉居住，和日本军政浪人往还密切，准备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，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东北却很不满。当时日本用各种办法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